

# 紅軍女战士

徐向前題

一九八五年十月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BC99122

87  
K822  
170

2

# 红军女战士

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办公室 编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358871

---

责任编辑：张胜莲  
封面设计：蒋万景

174

### 红军女战士

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办公室编

\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5.625 插页4 字数：120,000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500

统一书号：11102·75 定价：0.88元



文 媛



彭 素



汪荣华



林月琴



叶桂芝



周起义



史玉清



张少先



胡开彩



李 静



78



陶静冰

照片由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办公室提供

## 序 言

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长期斗争中，广大妇女一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。在旧社会，她们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封建礼教的束缚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一旦她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，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，那被压抑的聪明才智和斗争精神就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，化为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。

“小小黄安，人人称赞。锣鼓一响，四十八万。男将打仗，女将送饭”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许多苦大仇深、首先觉醒的妇女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，毅然投身革命，同男同志一起并肩作战，前仆后继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鄂豫皖苏区的广大妇女，在推翻反动统治、建立苏维埃政权、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中表现十分突出。很多人踊跃参军，南征北战，奋勇杀敌，甚至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；很多人奋勇支前，送弹药、运粮食、抬担架、救伤员，担负起繁重的后勤工作。在严酷的白色恐怖时期，她们在敌人的屠刀下，横眉以对；在敌人的凌辱前，顽强不屈，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。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我在鄂豫皖苏区工作期间，就曾目睹苏区广大妇女踊跃参加红军。在长征途中，红军女

战士们爬雪山、过草地，艰苦奋斗、英勇顽强的光辉业绩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时至今日，每当回忆起当年的情景，就使我感奋不已。红军女战士们，无论是在根据地坚持斗争，或是参加长征，她们那种坚持信仰，矢志不渝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勇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表明了她们不愧是英雄的中华好女儿！

今天，在建设四化、从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，我国妇女始终起着半边天的作用。因此，把战争年代红军女战士的动人事迹整理出来，无论是对教育人们重视妇女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，或是对振奋广大妇女的革命斗争精神，为中华的腾飞而努力奋斗，还是对教育后代继承光辉的革命传统，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、守纪律的共产主义一代新人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洪学智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

# 目 录

序 言 .....	洪学智( 1 )
在老一辈革命家的身边 .....	文 媛( 1 )
迎着困难前进 .....	彭 素( 15 )
征途漫忆 .....	汪荣华( 24 )
从金寨到延安 .....	林月琴( 40 )
虎口脱险 .....	叶桂枝( 61 )
“金莲”万里行 .....	周起义( 67 )
回忆参加长征的片断 .....	周东屏( 81 )
在革命家庭中成长 .....	戴觉敏( 89 )
为革命拿起手术刀 .....	范 明( 99 )
“不能回家” .....	郭 明( 113 )
战斗在金刚台上 .....	<u>史玉清</u> ( 117 )
在红军被服厂里 .....	张少先( 130 )
忆三位钢铁女战士 .....	胡开彩( 135 )
舍子救红军 .....	<u>张尚文</u> ( 148 )
从思想启蒙到走向革命 .....	李静一( 155 )
在巢县“住机关”的日子里 .....	陶静冰( 167 )
后 记 .....	( 174 )

# 在老一辈革命家的身边

文 媛

---

作者文媛，安徽省金寨县人，1911年生。1926年入团，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。1932年到上海党中央分局做地下工作，后赴江西苏区，在中央局机要科任译电员。1938年到延安，曾任边区银行机要秘书。1945年在辽宁任省公安厅股长。1949年南下，先后任湖北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、劳改局副局长、省政协委员等职。

---

从一九二八年算起，我参加革命已有五十多年了。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，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，没有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浴血奋战，也不会有幸福的今天。所以，每当我看到祖国蒸蒸日上、欣欣向荣的景象时，常常思绪万千，激动不已，禁不住回想起那些令人难忘的战斗岁月和走过的艰辛道路。

一九一一年，安徽霍山县一个礼教森严的赵氏门宅里又添了一个女孩子，她就是我。我母亲生了四个儿女，其中三个夭折了。当时，祖父虽在霍山县衙门供职，但这个地主家庭年年入不敷出，已濒于破产境地。我还不会叫爸爸的时候，父亲就因病离开了人世。在我六、七岁时，祖父请了一个私塾先生，到家里教我们识字。那个朝代重男轻女，女孩子是不准到外面上学的，只要在私塾里识几个字，学会写信、看书

就行了。可这怎么能满足我们求知的欲望呢？

也就在那时，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，使我对旧礼教产生了怀疑和动摇。我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姑姑，她的未婚夫因病死去。为了守节，她竟然服了黄金和鸦片膏自杀身亡，而家里人还大办丧事，宣扬这位可怜的“烈女”。这个悲剧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颗不甘沉沦的种子。

祖父死后，我们赵氏家族的根基开始动摇。我和慧媛、信媛三姐妹以及侄女国璧冲破种种清规戒律，离开家庭，来到霍山城唯一的一所女子高小求学。此后，我不断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，逐步成为这个封建家族的叛逆者。

我当初并不懂得什么是革命，也不知道如何去革命。曾记得，霍山女子高小有一位从安庆来的语文老师郭诚淑，为人正派，待人和蔼可亲。我们都喜欢同她接近，直到参加革命后，我才知道她和爱人曹逸新都是中共地下党员，并直接与从事兵运工作的刘澍西同志单线联系。刘澍西的家乡在霍山桃源河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党派他从武汉回到霍山工作，不久打进了诸佛庵民团，担任团总。他按照党的指示，积蓄革命武装，准备暴动。

在郭老师的教育下，堂妹慧媛加入了青年团。这段时间，我的见识比在家乡多多了，也知道了有一个被穷人称为“打富济贫”的共产党。当时，郭老师和其他地下党员经常给我们谈革命的道理，讲封建制度下妇女地位低人一等，讲包办婚姻带来的悲剧等等。这些都激发了我们对旧社会的不满，使我们懂得了，只有起来闹革命，只有消灭封建剥削制度，妇女才能彻底解放。从此，我们这些不曾引人注目的黄

毛丫头，如吴兆瑾、汪宝华、孙光璧、慧媛、信媛、国璧等人，开始在县城里闹起来了，弄得当地豪绅不能安宁。县里有个洪科长，宣扬打官司有钱就有理。他依仗权势和受贿，欺压穷人。我们便点名道姓地反对他。这下洪科长慌了手脚，便下帖想请我们到陈家花园吃饭，企图拉拢。我们严词拒绝，弄得他狼狈不堪。

这时，刘澔西也常来对我们讲一些革命的道理，讲掌握革命的武装的必要性。有一次，他对我们说：“闹革命，光搞鼓动和宣传还不行，还要有自己的军队。”经过刘澔西的教育，我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，在他的介绍下，我与信媛加入了青年团，刘澔西成了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。

一九二九年五月，按照党组织的指示，刘澔西发动了诸佛庵兵变。这为是年十一月爆发的六霍起义准备了重要的武装力量。兵变发生后，刘澔西的身份暴露了，国民党下了通缉令。他被迫转移到安庆，不久郭诚淑也去了安庆。

他们走了以后，我们失去了组织联系，好象大海里的一叶小舟，不知划向何方。为了尽快同组织取得联系，经商量，我与吴兆瑾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也到了安庆。

到安庆后，我设法找到了郭诚淑。按照她的安排，托人代我考上了安庆女子职业学校，住在附近的宣城旅社，靠地下党组织解决食宿问题。这时，我虽然名义上是学生，实际并没有去上过课。我和吴家芷、刘乐英一起，常常到外面散发传单，张贴《告士兵书》等。

不久，由于坏人告密，刘澔西、郭诚淑被捕了，我和吴兆瑾等也被捕。捕前一天，我还在散发传单，身上留了一份《告士兵书》，想晚上看看。被捕时，这份《告士兵书》还

绑在自己腿上。为了销毁这份传单，我借故上厕所，但有军警跟随监视，一直下不了手，只好把传单揣在棉裤里。我们被抓到公安局后，就要受审。这时，我看见涪西被军警押着先去过堂。他用手提着脚镣，态度从容。当他走到我们跟前时，便压低嗓门偷偷地说：“你们是学生，来考学的，不要乱说。”我是第一次被捕，又加身上揣了一份传单，心里不免有些紧张，不知如何处置。经他一指点，我心里就一下亮堂起来。

敌人审问涪西时，他大义凛然，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，说后，随手抓起一个电灯泡，向公安局长狠狠砸去。这时，堂上大乱，好几个杀气腾腾的军警扑上来，把他按倒在地，用拳棒毒打，还给他换上八斤重的大脚镣和手铐，手背肿得象馒头似的，鲜红的血浸透了衣裳。我见了涪西伤残的身体，心里一阵难过，竟情不自禁地失声而哭。

轮到我被提审时，公安局长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共产党？”我装着听不懂，反问他：“什么是共产党？”他又问：“你是不是国民党？”我又反问：“什么是国民党呀？”我当时年龄不大，又是个女学生，敌人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便把我和其他人一起关在公安局的一间看守所里。记得有一次晚点名时，一个军警叫到我的名字，把婉媛念成婉暖，我有意不回答。他便狐假虎威地吼起来，厉声问我：“为什么不答话？”我说：“我不叫婉暖，叫婉媛。”还故意把“婉媛”两字念得重一点。那军警知道念错了字，脸涨得通红。

在看守所里，我和一些鸦片贩子关在一起，看守是个老婆子。这时，我身上还有一份《告士兵书》，便把这事偷偷告诉了吴兆瑾。听后，她责怪我：“死丫头，你还不赶快处理掉！”我急得真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怎么办呢？我只好晚



上在被子里，把《告士兵书》一页页的搓烂，然后丢在马桶里。哪知纸团在里面漂浮起来了，真急死人呀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对看守婆说：“我去倒马桶。”但她不准。我又只好把马桶拎出来，一直盯着值日把马桶倒掉，一颗悬在心上的秤砣子才掉下来。

敌人虽然多次提审，却从我嘴里掏不出来半点东西。他们没法，又把我转到法院的一个大牢里。在那里我认识了刚从苏联回国被捕的袁溥之、王惠芬等同志。到法院以后，我们几个人把字条夹在生活用品里，互相递送，相互鼓励，同时把里面的情况转告给党组织。这时，党组织派人为我们四处奔波，托人说情作保，请律师作辩护。法官先后两次审问我，而我一口咬定自己是学生，是来安庆考学，被他们无缘无故抓来的。由于当局抓不到我们的一点把柄，只好把我和另外几个同志放了出来。

这时，我又回到了宜城旅社住下，组织上马上派人同我取得了联系，并指示我继续留在安庆，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。工作不到两个月，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，从霍山来了一批土豪劣绅，他们说我们都是共产党，要求国民党省党部把我们捉拿归案。我已无法在安庆容身了，组织决定我立即转移到上海，并且派一个姓张的交通员护送。还记得，离开安庆那天，正好下着雨，交通员为我雇了一辆黄包车，并且把布帘也放下来。我们顺利地到了船码头，上了船，顺流东下了。这时已是一九三〇年的七、八月间了。

船行了三天，到达上海。我拿着介绍信，找到王日叟同志，接上了头。组织上安排我住在爱文义路中央军委机关，同我一起的还有徐子胜同志的爱人谭冠军。大约住了个把月，